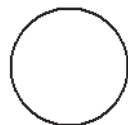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 QI



一九五九年

22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二期 ★

目 录

充分发挥先进生产者在群众运动中的

作用..... 刘宁一 (1)

短
论

更大规模地开展技术革新

运动..... 许辛学 (5)

在新生事物面前..... 施东向 (7)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

斗争..... 陈伯达 (11)

一九五九年安徽省工业生产继续跃进

的形势..... 李任之 (17)

路是人走出来的..... 欧 根 杨真慰等 (24)

关于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若干问题

..... 关梦觉 (30)

编者的话..... (41)



充分发挥先进生产者在群众运动中的作用

刘 宁 一

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的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反右倾、鼓干劲，掀起了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高潮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这次大会的六千五百多名代表，代表着近三十万个先进集体和三百多万名先进生产者。这是一次空前盛大的“群英会”。它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群众运动的壮阔声势和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宏伟景象。这次大会，检阅了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总结和交换了大跃进以来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的经验。无疑地，它对于掀起更大的生产建设的群众运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继续全面跃进，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革命和建设的群众运动中，总是会涌现出无数的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对于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的作用，我们党从来是十分重视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要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善于发现和培养群众中的先进人物，大力支持群众的先进创

造和英雄行为。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各个革命根据地，曾经多次召开过在革命斗争或是后方生产建设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大会。建国以来，中央和地方都不断召开过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党一贯重视宣传先进人物的事迹，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并且号召群众开展向先进人物学习的运动。

我们党所以一贯重视群众运动，一贯重视先进人物，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出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的历史，是生产者的历史。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我们党几十年来，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都一直坚持大搞群众运动。先进人物是群众的优秀代表。重视先进人物，就是重视群众。为了领导和开展群众运动，为了贯彻党的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就必须充分发挥先进人物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



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①毛泽东同志总结出来的这个原理，具有普遍意义，它对于生产建设也是完全适用的。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生产是永远处在发展变动的状态中的，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代替着旧的生产技术。因此，在任何时代，在任何生产部门中，总是有少数比较先进的生产者，他们采用着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着比较先进的生产定额。随后，就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者学会了他们的技术，达到了他们的定额，直到最后，原来是少数先进分子的生产水平就成为全社会的生产水平，社会生产就提高了。如果有重大的生产技术的发明，就要引起生产技术的重大改革，创造生产的巨大高涨。因此，先进生产者是人类经济生活向前发展的先驱，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先驱。”^②

我们党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党的路线和政策，从来就是通过群众运动实现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产生大批先进人物，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工作中或是生产中创造出优异成绩，树立榜样，从而又推动群众运动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再产生更多的先进人物，又推动群众运动更向前发展。这就是群众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党正是掌握着这样一个规律，不断地在群众运动中发现和培养先进生产人物，团结和依靠他们推动群众运动不断前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跃进。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

各个战线上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的大量涌现，成倍地增长，更加有力地证明了群众运动发展的这一规律。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最快的速度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观能动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党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正因为这样，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涌现了成批的先进单位和英雄人物，他们作出了翻天覆地的事业，创造了我国从古未有的英雄事迹。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大量涌现出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是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好得很的大事。毛泽东同志对于劳动模范，也就是先进生产者的作用，曾经作过很好的概括，指出他们是群众运动的带头人，是人民群众的骨干，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先进生产者的这种“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必定会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成为广大职工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榜样。

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在群众中的榜样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00页。

②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1956年召开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的祝词，见1956年5月1日人民日报。



作用，首先在于他们思想先进，他们具有工人阶级的坚定立场，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正由于这样，他们才能不断革新技术，在生产上不断创造奇迹。詹水晶所以能够那样勤勤恳恳，十年如一日，不出一件废品；徐永基所以能够那样刻苦钻研，突破薄壳结构设计尖端技术；马学礼所以能够那样诚恳帮助别人，革新技术，创造集体荣誉；徐学惠所以能够在紧急关头，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抢救国家财产，都不是因为别的，正是因为他们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心。他们热爱党和党的领袖，永远听党的话。他们有着高度的工人阶级主人翁的责任感，为着党和人民的利益，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他们有旺盛的革命干劲，虚心学习，从不满足已有的成就，不断革命，不断前进。他们总是走在时间的前面。他们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发扬了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他们勇于创造，敢想、敢说、敢做，富有钻研革新精神。他们有着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平凡的劳动中，作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集中地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战斗意志，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只要我们很好地组织群众学习先进生产者的这些崇高品质，就能够促进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普遍提高。而人民群众觉悟愈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也就愈快。

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的榜样作用，还在于他们不断地用新的技术，突破生产定额，创造新的生产纪录，多快好省地全面完成生产任务。他们既是干劲冲天的闯将，又是技术革新的能手。他们所创造的先进经验，是社会的宝贵财富。群众学习和掌握了这些先进经验，就能够迅速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赶上先进。群众生产技术的迅速提高，必然会推动生产建设事业的迅速跃进。本溪钢铁公司第一炼铁厂青年高炉的职工，用一个五十多年的老炉子，创造了全国高炉利用系数的最高纪录。这个创造，鼓舞了全公司职工和整个高炉炼铁系统的工人，使他们接连不断地创造出各项先进纪录，推动了生产的全面跃进。安徽省的小高炉炼铁，今年首先是马鞍山红旗二号小高炉的职工举起了高产、优质、低耗的红旗；接着，蕪湖职工创造了小高炉的大面积丰产纪录，第二季度平均利用系数达到一点零八；继之，蚌埠职工八月份以平均一点一七七的成绩赶过了蕪湖；九月份蕪湖职工又以平均一点四三五的新纪录再度领先。这样，就促使安徽全省小高炉平均利用系数，由一月份的零点六三六，迅速提高到九月份的一点一二四。这样的例子，在全国很多。今年以来，各地组织先进生产者巡回表演，现场观摩，对于推动群众技术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带来了生产上普遍的大面积丰收。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在各个生产战线上开展的“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竞赛运动，是使先进人物和广大群众密



切結合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个竞赛运动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充分发挥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的作用，使先进經驗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广泛的群众中傳播开来，普遍提高群众的生产技术水平，不断解决生产中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推动生产向前发展。同时，它又动员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人人争先进，个个争上游，后进赶上先进，先进更加先进，使广大群众不断革命，不断前进。现在，全国各地在开展大竞赛的同时，还加强了大协作。不仅在企业内部开展了大协作，而且在厂和厂、产业和产业、工业和农业之間也开展了大协作。这种国民經济各个方面的大协作，产生了新的生产力，将促使我国的国民經济繼續不断地跃进。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的总路綫，反

对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因此，他們总是千方百计地打击先进生产者，向先进生产者泼冷水。我們只有坚决同右傾机会主义作不調和的斗争，把右傾反透，保护先进生产者的积极性，支持先进生产者的首創精神，才能使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持續不断地、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推进。

现在，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設、財資方面的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已經胜利閉幕，六千多名代表带着党和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回到了各自的崗位。这許許多多先进人物，分布在全国各地，他們和全体职工一起，一定会使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展起来，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并作好一切准备工作，争取一九六〇年国民經济的繼續跃进。

钻 工 之 歌

• 河北民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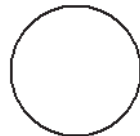
我爱钻塔高又高，
頂天立地入云霄，
钻塔下面馬达响，
钻塔尖上紅旗飘。

我爱钻机意志坚，
打入地球破层岩，

一根铁臂三千丈，
不得煤层心不甘！

钻塔钻机是好汉，
终年伴我走千山，
千山万水都走遍，
开发山河找富源。

(原載“紅旗歌謠”)



更大规模地开展技术革新运动

許 辛 学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在我们的工业和运输战线上，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使生产、建设得到了一月高于一月的增长，得到了高产、优质、低耗、安全生产的全面跃进。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使这个新高潮一浪高一浪地、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要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导下，把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结合起来。

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大量事实，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技术条件相同，干劲不同，劳动效果显然不一样。拿最近的事实来说，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许多企业的技术条件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只是因为反对了右倾，鼓足了干劲，生产却比以前有很大的增长。党中央提出的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的正确性，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反右倾就是要强调政治挂帅，要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这样就能够更好地鼓干劲，能够更好地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能够使职工更好地注意掌握物质技术条件，广泛地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从而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上海建设机器厂全体职工今年一开始就热烈响应了上海市委继续鼓足干劲、大闹技术革命

的号召，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蚂蚁啃骨头”的加工方法，从一只“蚂蚁”一道道啃，变成几只“蚂蚁”上、下、左、右、前、后成群结队地围攻。这样，大大缩短了机架加工时间，从一只机架原来需要五十九天加工时间，缩短到三十天、二十天，最后只用十七天。全厂以四个半月的时间提前完成了两套六百三十公厘轧钢主机机的任务，并在九个月时间内完成了一千一百五十余吨轧钢机和转炉等重要设备任务；一至九月份产值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五点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多；工人劳动生产率达到每人四万一千一百四十三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产品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六，上缴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二倍多。又例如，大连造船厂的铜工车间，为了要完成今年的增产节约任务，原来准备增加七十三名技术工人，后来采取了七项技术组织措施，解决当前生产中的关键问题，有的工序操作提高了效率十五倍，全车间不增加工人，就可以超额完成任务。

从多年来的大量事实看出，党中央提出的实干、苦干和巧干相结合，劳动热情和革新技术相结合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实行了这样的方针，就可以使广大群众能够经常地鼓足干劲，并且能够用同样的劳动消耗取



得愈来愈大的经济效果。为了取得生产的持续跃进，我们必须把目前高涨着的群众运动巩固起来，并且持续地发展下去。即使现在群众干劲很大、群众运动已经很好开展的企业，也仍然要继续不断地做好这项工作。

又要苦干，又要巧干；又要高度的劳动热情，又要不断的技术革新。每个企业的领导同志都必须清楚地看到技术革新对于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提高劳动强度，可以使生产一倍、两倍地增长；而不断地革新技术，却可以使生产几倍、几十倍甚至百倍、千倍地增长。而且，技术的进步，能够保证和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产品的成本，能够使职工有劳有逸地、比较均衡地进行生产，避免加班加点、时松时紧的现象。因此，要使群众的干劲持久下去，并且愈来愈大，一项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引导群众发挥集体智慧，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不断地改进物质技术条件。

我国的工业和运输企业，就目前的技术状况来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技术落后的企业，这主要是大跃进以来新建的小型土法生产的企业，它们经过一年多来的技术改革，有的已经变成小型洋法生产的企业，有的已经变成“土洋结合”的企业，但是它们的大部分劳动，还是用手工进行的。这类企业迫切地要求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逐步实现半机械化以至机械化。第二类是技术比较落后的企业，这主要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企业，在解放以后，有一部分企业进行了扩建或者改建，采用了或者部分地采用了现代化的技术，但是就多数企业的技术条件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这一类企业同

样迫切地需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特别是需要改进设备，消除薄弱环节，使费力的手工劳动实行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第三类是技术先进的企业，这主要是全国解放以后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帮助下新建的大型企业。这类企业的设备是现代化的，生产效率高，但是它们在改善工艺、改进设备、改进产品设计等方面仍然有很多的事情可做，在提高设备效率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潜在力量。比如，哈尔滨的量具刀具厂，是一个现代化的工厂，由于这个工厂的职工最近在上述几个方面进行了技术革新，就使生产效率提高了七倍多。有人认为，在技术落后和比较落后的企业中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有“文章”可做，在技术先进的企业中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就没有什么“文章”可做，这显然是不对的。当然，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必须从各类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根据可能的条件，实事求是地进行；在方法上应当多种多样，在步骤上应当有缓有急。

落后的变成先进的，先进的变成更先进的，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人们可以自觉地掌握这个规律，所以，技术进步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技术进步的速度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而要自觉地掌握这个规律，我们就应当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把敢想敢做的风格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把放手发动群众和一切经过试验结合起来，把提高劳动技能和学习科学技术文化结合起来。

在工业和运输部门中，广大职工积极地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只是最近三个月以来，成功的事例就有几百万件，革新的能



手就有几十万名。我国的工人阶级有伟大的创造才能。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更有计划地、更有组织地、更大规模地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把我国的工业和运输业逐步地提高到现代化的技术水平。所有的企业都应当在党委的领导下采取各种有效的办法，在不断提高职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同时，不断提高新老工人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知识水平，加强对新工人的技术训练，提高每个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这样就可能

在他们中间涌现出愈来愈多的革新家和发明家。

设备和工具的改革，对于生产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工人们有了更高的政治觉悟，有了更多的生产经验和更高的劳动技能，就不但能够更好地运用现有的设备和工具，而且能够创造出效能更高的设备和工具。只要在组织生产中把人的作用和物的作用很好地统一起来，我们就能够使技术不断革新和不断革命，使生产不断跃进。

在新生事物面前

施东向

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下，创造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这些光芒万丈的新生事物面前，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嘲笑？生活本身迫使每个人作出回答，事实上每个人也都作了回答。人民群众对于自己的伟大创造，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感。国内外的敌人，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开始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疯狂的攻击。而党内的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千方百计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了污蔑和反对。

怎样对待新生事物，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

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待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根本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社会主义新事物的无产阶级和代表资本主义旧事物的资产阶级的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①

一切事物的发展，从来就是新旧斗争的

^① 见“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一文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页。



过程，是新事物萌芽、苗长、壮大，旧事物衰老、死亡的过程，是新生事物经过曲折的道路战胜陈旧事物的过程。生物界中的新陈代谢是这样，社会当中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新生事物一出现，必然冲击着陈旧的东西，它的出现，就预告了旧事物的灭亡，因此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生活中，迄今为止，新旧斗争很少不同阶级利益发生关系。在这个领域里，新生事物必然要触犯反动势力的利益，而一触犯反动势力的利益，便立刻会激起他们的阶级仇恨。

新生事物代表着发展的方向，必定战胜旧事物，这是客观规律。在社会生活中，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归根到底是要胜利的，是不可阻挡的。但是这种胜利如何达到，则决定于革命力量的斗争。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新生事物，有哪一桩没有经过坚忍不拔的艰苦战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些新生事物，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没有全国人民的坚决奋斗，如果不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打退，它们能够像现在这样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吗？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世界观的共产党人，从来都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新生事物这一方面。共产党之所以永远能够站在历史行程的最前列，永远能高瞻远瞩，指引劳动人民奔向最远大的将来，就因为始终紧紧依靠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无产阶级

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前途的阶级，它和最新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①资产阶级也曾经代表过新兴的东西，当他们进行革命的时候，也曾经一度喊过反对旧制度的口号。但是曾几何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便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反对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又成为历史发展的绊脚石了。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已经被踢到垃圾箱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最后也必定要被各国人民踢进垃圾箱里。

历史已经注定：不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趋于消灭，个体经济制度，因为它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也不能摆脱没落的命运。只有无产阶级，能担当起解放整个人类的使命，因为它只有“消灭全部至今存在的占有方式，才能获得社会的生产力。”^②无产阶级对旧的社会制度毫不留恋，它永远是建设新社会的先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除了摆脱自己身上的锁链和贫困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失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③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已经不再是“无产者”的时候，它也最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6页。

② 同上书，第4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心于不断革命，因为它的利益就在于使社会生产不断发展，就在于使社会生活不断更新。

正是无产阶级这种阶级地位，决定了它永远朝气蓬勃、一往无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永远把最大的注意力倾注于新生事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恶毒攻击，完全是反映了濒于灭亡的资产阶级对新兴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的恐惧和仇恨。

当然，社会上的新旧斗争并不完全和阶级斗争联在一起。有些事情，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差异，也会表现为新旧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消失。新旧斗争永远存在，是一个普遍规律。

反对新生事物的人，有一种理由：新生事物“有缺点”。

怎么会没有缺点呢？新生事物既然是新的，它在发展中就没有现成的规矩可循，所以常常不可避免地要走些弯路，甚至还要受些挫折。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最重要的问题是：它是新生的事物，它代表着未来；虽然有些缺点、走些弯路，它终于会战胜旧事物而取得统治地位。不管有多少缺点，它总比趋向死亡的旧事物要高明万倍。列宁说：“在这个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改造他们整个生活的真心实意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成就，在欢呼劳动者方面得到的成就。”^①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他们创造着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创造着新事物，他们的行动构成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他们实现着伟大的革命运动。群众运动扫除陈旧的渣滓，使新生的幼芽峥嵘茁长。这样一场摧枯拉朽、除旧布新的战斗，怎能没有缺点？身穿长袍站在堤上观潮的先生们，埋怨浪花溅湿了他的衣裳，觉得浪头太“粗暴”了。但是，这又何损于群众运动的伟大，又何损于新生事物的光辉？谁要是以为新生事物能够没有缺点，或者“应当”没有缺点，谁要是要求新生事物一出现便立刻十分完备，那就正如毛泽东同志说过的，他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因为现实生活不可能这样。硬是要求“没有缺点”的新生事物，那就只能是根本反对新生事物。

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其实并不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有缺点。历来旧势力反对新事物，都是借口新事物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讥笑新的幼芽软弱，抱着轻浮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②

共产党人对新事物的成长，充满着坚定的信心，同时在自己的工作中，又总是高度热情地关怀和培植新生事物，为新生事物的

^①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页。

^②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7页。



苗茁壮成长創造着各种条件，像园丁照护幼苗一样，像母亲抚养婴儿一样。共产党人是新生事物的自觉的促进派。共产党人完全懂得，社会主义这样的新生事物是不可能自发地取得胜利的。当人民公社的雛形在中国农村刚刚出现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当人民公社化运动广泛开展以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又及时地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促使人民公社这个伟大的新事物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巩固。难道事实不是这样证明着的嗎？

在新生事物面前，由于人們抱有不同的立場和世界观，就会有不同的态度和行动。有些同志对于新生事物，虽然并不像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样全盘否定，但是他們或者怀疑动摇，或者无动于衷，或者一旁观望。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立場和思想对他們的影响。

在我們革命队伍中，一切犯有右倾保守思想錯誤和反对新生事物的人，都是不同程度上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縛，脱离生活、脱离实践和脱离群众的。毛泽东同志曾經针对这种人說：“一种新事物出现，他們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輸，做一点自我批評。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們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的，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

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時間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經驗，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頑症的有效药方，奉劝人們不妨試一試。”^①

社会主义革命一天天更加深入，社会主义建設一天天迅速发展，要求人們彻底拋棄各种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旧傳統、旧习惯，要求人們彻底清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傳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傳下来的各种观念。”^②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告訴我們，生活是常青的，社会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們的思想必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才能使自己的認識合乎客观实际。世界观問題不解决，即使对这个新生事物的錯誤态度得到糾正，还会在另一个新生事物面前犯出同样的錯誤来。一个人要能够永远站在新生事物方面，做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战士，就必须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日益发展，不断地进行自己思想上的革命，就必须根除资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完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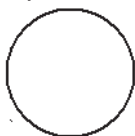
① 見“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語。“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8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9頁。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 世界观的斗争

陈伯达



我们全党现在正在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思想意识上来说，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在党的总路线的旗帜下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全国人民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为什么这时候在我们党内却有少数人打起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旗子，站在同党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呢？

我们必须从阶级斗争的现象来看待这个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向来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终结，而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还没有完全灭亡，只要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还存在，那末，就还会有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不但要采取各种办法反抗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要采取各种办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资产阶级反抗社会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影响我们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党内有些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顽强地保存资产阶级意识的人，在阶级斗争表现尖锐的某种时机，就往往要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来进行反对党的路线的活动。这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不是别的，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反抗。

现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不少是在民主革命中带着资产阶级要求加入党的。他们实际上是党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就是说，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已经入党很久，但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他们虽然在口头上也带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总是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在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当然，我们党内有很多人在参加党以前，也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在参加党的时候，也还带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有的很浓厚，有的少一点。但是其中大多数在革命的斗争中，愿意接受党的改造，抛弃了他们原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接受了无



产阶级的世界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不是这样，他们一直没有接受改造，还是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

每个共产党员，不管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怎样，加入党的第一条，就是要接受党的纲领，包括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可是，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说，他们有没有接受党的纲领呢？由于他们没有抛弃自己原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以，他们就不能接受党的最高纲领，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即使对于党的最低纲领，也只能接受那些合乎资产阶级革命家所需要的部分，而不能全部接受。在实际上，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的资产阶级纲领。

右倾机会主义者提出的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相对抗的纲领，说来说去，不外两条：第一条，反对党的领导；第二条，反对群众运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政治挂帅，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否认革命专政，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群众运动，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经惊惶失措，经常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现在，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对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更加表现惊惶失措，以致不惜进行种种的攻击和污蔑。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就不能够充分发扬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就不能够高速度地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实质正是这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是在灭亡中的资产阶级向我们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的一种绝望的进攻。

不论在民主革命阶段或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党的纲领问题集中到根本的一点，即集中到政权的问题，而政权问题就是阶级专政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我们的民主革命的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都是要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即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这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

在我国，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进攻的矛头集中在党的领导上。国际间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无党制度’”。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从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社会主义事业。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反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上同资产阶级右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一样的。

右倾机会主义者说，他们并不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社会主义，他们只是不喜欢加强党的领导而已。但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各种政党是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任何阶级都是要通过自己的政党和领袖实行自己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也是这



样。列宁老早駁斥过那种所謂“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的荒謬提法。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們党就一直认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是一小撮极端反动的剥削阶级对于全体人民的专政。我們党从来把推翻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同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当做一件事，而不是当做两件事。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的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們的革命，就是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統治，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是要代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全体人民，我国絕大多数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对于少数剥削者，对于极少数人的专政。这种革命专政，必須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不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别的，就是共产党担负国家的领导权。我們怎么能够把党的领导同阶级的专政分开呢？沒有共产党的领导，沒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我国人民怎样能够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統治，而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呢？又怎样能够再进一步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呢？又怎样能够建設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领导人民創造幸福生活，开辟将来共产主义的新天地呢？否认共产党对于革命和革命专政的领导，也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否认社会主义，否认人民的一切，这一个道理是很清楚的。

在一九五七年，有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經举起什么“自由”啊，“平等”啊，“博爱”啊这些旗子来反对社会主义。我們党内有些右傾机会主义者也很欣賞“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們生活在二十世紀的革命的中国，而思想却留在十八世紀的法国。他們信奉的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所謂“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认为民主革命要实现的是这种口号，社会主义要实现的也是这种口号。这是完全不懂得什么是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对于各国革命的历史，也完全无知。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实质是什么呢？难道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为了追求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嗎？不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嗎？资产阶级当时提出这些口号，一方面是为了反对封建貴族的特权，而另一方面，正是要求自己在劳动人民面前享有絕对的統治权。资产阶级的所謂自由，实质上不过是要求有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做买卖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來說，就是劳动者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被掠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謂平等，在实质上，不过是要求买卖的不平等，要求他們有剥削雇佣劳动的平等；而对劳动人民來說，他們只有在被剥削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所謂博爱，在实质上，不过是要求把他們的剥削的触角能够无限制地伸張到一切他們可能达到的地方，要求尽量地扩大他們的国内



市場和国外市場，而对于被剝削被压迫的人民來說，則是要求他們向资产阶级的剝削感恩戴德。

馬克思說过：“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还有一块肌肉，一根脉管，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內，是决不会放手的。”^① 难道资产阶级所謂“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这样嗎？

馬克思主义者向来承认“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在法国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候，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又不断地指出了这些口号的极大欺騙性。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会把这些口号列入社会主义綱領，而且也不把它們列入民主革命的綱領。布尔什維克在俄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沒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綱領是：推翻帝国主义統治，推翻封建制度，沒收官僚資本，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等等。总之，不論是在俄国或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馬克思主义政党都沒有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作为綱領。并且，不只中国和俄国，凡是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的国家，只要那里有馬克思主义政党，他們也都不会把这些口号当作綱領，而总是把那种合乎本国人民群众要求的具体斗争目标当作綱領，把人民夺取政权的問題当作綱領。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然更不能把“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口号当作綱領。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經濟和政治”中曾說：“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籠統詞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誦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籠統詞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无异完完全全轉到资产阶级的理論和原則立場上去。”^②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基本完成，但是，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还一直留恋着他們那种所謂“自由企业”、“自由經營”，农村一小部分富裕农民也仍然留恋着过去那种可以雇工、可以做投机买卖的“自由”。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和富裕农民的感情和想法很欣赏，并且往往成为他們在党內的集中代言人。当着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取得了偉大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經濟制度和个体經濟制度要最后灭亡的时候，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用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来反对社会主义，他們代表了誰的利益是很明显的。

平等的概念也是一样。恩格斯說得好，“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真实內容，都归結为廢除阶级的要求。任何超越于这点之外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謬。”^③ 我們的一些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說的平等，在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所說的平等，他們所要求的，也就是富人和穷人不等，剝削阶级和被剝削阶级不等。这种說法历来是资产阶级为着保留他們的剝削制度和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4頁。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6頁。

③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9—110頁。



他們的特權，而對於群眾的欺騙。

馬克思早已駁斥過許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企圖利用“階級平等化”的口號來減弱和掩飾階級的对立。當他同巴枯寧鬥爭的時候，曾經指出：照字義了解起來，階級平等化就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這樣固執地宣傳的“資本與勞動的調和”。^①十月革命以後，列寧不斷地拆穿了那些資產階級代表人和叛徒們用自由平等的口號欺騙人民的伎倆。他說：“工人和農民作為勞動者是平等的，但飽腹的糧食投機者和挨餓的勞動者是不平等的。”^②在駁斥叛徒考茨基那一套“平等”胡說的時候，列寧這樣指出：“剝削者不能同被剝削者平等。這個真理考茨基很不喜歡，但它是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內容。另一個真理是：在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的可能性沒有完全消滅以前，決不能有真正的事實上的平等。”^③

在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里，統治階級絕不會給被壓迫的人民以平等；被壓迫的人民任務是要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而不是要求什麼“階級的平等”。在以無產階級為首的人民大眾經過革命取得政權而反動階級成為專政的對象以後，在已經成為國家主人的人民大眾和已經被打倒的反動階級之間，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平等。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是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建設社會主義，徹底消滅階級，也不是要求什麼“階級的平等”。在這時候，要求“階級平等”不過是那種不甘心於滅亡的剝削階級的一種叫囂。資產階級右派發出了這種叫囂來向社會主義進攻，而右傾機會主義者則在黨內響應這種叫囂。

即使在階級消滅以後，在社會主義完全實現以後，要完全消除任何不平等，也是不可能的，這種提法也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恩格斯說得好：“消除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這句用以代替“消滅一切階級差別”的話，也是很成問題的。在各個國家、省份甚至各個地方之間，在生活條件方面總是要存在某種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將來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永遠不可能完全消除。……把社會主義社會當作平等樂園的觀點是個與“自由、平等、博愛”這一舊口號有聯系的片面的法國觀點，——這個觀點作為一定的發展階段在當時當地曾是正當的，但是現在這個觀念則像以前社會主義學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樣應當克服下去，因為它只能引起混亂，並且因為現在已經有了闡述這個問題的更精確的方法。”^④

右傾機會主義者滿腦子堆了那些資產階級的觀念，他們在我們的隊伍里面，實際上是以資產階級革命家的身份進行活動，而不是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身份進行活動，不是以馬克思

① 見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局信”（1869年3月9日）。

② 列寧：“在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3頁。

③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4頁。

④ 恩格斯：“致倍倍爾的信”，1875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5年版，第40—41頁。



主义者的身份进行活动。他们虽然是党员，但是，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同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对立的，由于他们怀抱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平常的时候，他们总要闹别扭，常常不遵守党的纪律，不照顾党的团结和全局，而一遇到大的紧急关头，一遇到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起来公开反对党的正确领导。

现在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和党从来就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在民主革命时期，这种分歧主要地表现在革命方法上。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问题已经不是革命方法上的分歧，而是要不要革命的分歧；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是还要不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分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坚定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相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在实际上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要为资本主义制度复辟开辟道路。

当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我们进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这样指出过：“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哪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①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说明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为什么我们必须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严肃的不调和的斗争。

这次我们全党正在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斗争，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因此，必须认真进行。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首先必须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得彻底。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应该在离开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该是到猛回头的时候了。认真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党的教导，接受同志们的帮助，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回到党的总路线上来，这是他们的出路。而一切共产党员在这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这场保卫党的总路线的斗争中，也要下决心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提高自己。我们的革命是不间断的，我们的思想革命更不应当停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是我们经常的任务。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0页。



一九五九年安徽省工业生产继续跃进的形势

· 李任之 ·

一九五九年安徽省的工业生产战线，和其他兄弟省、市一样，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全面跃进的形势。

安徽省工业基础原来非常薄弱。建国以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安徽人民坚决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钢铁生产一马当先，其他各项工业生产也随着飞跃前进，安徽省工业落后状况开始迅速地发生变化。厂矿建设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土到洋。工业面貌焕然一新。

安徽人民乘风破浪地前进。一九五九年，在工业战线上掀起了持续不断的增产节约高潮，显示了更好更全面的跃进景象。今年安徽省工业生产的继续跃进，有下面两个特点。

一个特点是：钢、铁产量加番跃进，其他各项工业生产增长幅度很大，保持了高速度发展。今年全省钢的产量，按国家计划为十三万吨，一至十月份生产了十三万六千吨，已

提前六十四天完成国家计划；铁产量按国家计划为一百八十万吨，今年一至十月份已生产了一百六十三万吨；煤炭产量按国家计划为一千五百万吨，一至十月份已生产了一千二百六十八万吨。在以钢为纲的带动下，其他各项工业产量，据统计，今年一至十月份比去年同期都有很大增长：机械增长了百分之一百，电力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二，棉纱增长了百分之二百六十三。今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计划为四十亿元，一至十月份已完成三十五亿零五百万元，预计全年的完成数可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多。这种增长速度是较高的。在各个工业部门的生产中，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也是全面跃进的。以炼铁生产为例：一月份小高炉利用系数只有零点六三六，十月份提高到一点二六；焦比一月份为一点九七六，十月份下降到一点一三九；生铁合格率三月份为百分之五十五点七，十月份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九点零四；生铁成本第一季度平均每吨为四百六十七元，十月份降低到平均每吨二百六十二元。劳动生产率也有了很大提高。经过整顿劳动组织，在工业系统中动员了三十多万人转移到农业生产战线上去，



而工业生产依然保持高速度发展。这样，基本上实现了高产、优质、低耗的要求。

另一个特点是：各个工业部门不仅逐月做到了均衡生产，而且工业产量都是稳步上升的。今年一至十月份，安徽省钢、铁、煤等主要工业产量的月产水平，是不断增长、步步提高的。在七月份，小高炉铁的产量比六月份略有下降，但省的重点企业马鞍山钢铁公司，生铁产量仍然是上升的。今年夏天，虽然个别工业部门受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刮起来的一股冷风的影响，产量有点小的波动，但由于省委顶住了这股歪风，这种情况也就很快扭转过来，从总的方面说来对我们没有大的影响。

一九五九年的继续跃进，正进一步改变着安徽省的工业面貌。过去，安徽省主要工业产品一向依赖外省供应，现在，大部分能够自给，有的产品还能向省外调出。过去，许多设备不能自己生产，现在，对于工业上的某些设备，如一般的矿山、冶金、电动机、机床、仪表、运输以及农业和水利等机械产品，自己都能制造，工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过去，安徽省工业残缺不全，现在，很多重工业、轻工业，大型的、中型的和小型的企业，都已经逐步建立起来。

二

一九五九年安徽省的工业生产，为什么能够保持不断上升，继续全面跃进呢？这首先是由于坚持党的总路线，坚持跃进指标，不断地反右倾、鼓干劲的结果。

安徽省根据党的总路线和国家计划，制定了省的跃进指标。省委经过反复研究，根据主观力量（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很足）和客观可能（现有生产能力），制定了省的跃进计划，比起国家计划来，钢增产十万吨，铁增产三十六万吨，煤增产一百万吨。完成这个增产指标，虽然存在着一些困难，如运输力量不够，炼钢设备能力小，技术上还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等，但并非不能克服的。我们认为，超越了客观条件的许可，经过主观努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固然不可勉强去做，但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经过主观努力完全可以办到的事，一定坚持要办。我们不仅看到在实现跃进指标中存在困难的一面，而更重要的是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并重视去年大跃进中克服困难的丰富经验。我们肯定，只要鼓足干劲，充分利用炼铁设备能力，挖掘煤炭生产潜力和加速炼钢转炉建设，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省的跃进计划是可以完成的。因此，我们深入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号召苦干巧干，力争上游，不但要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且要保证完成省的跃进计划。

今年六月，国家调整生产指标时，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的精神，调整指标态度必须是完全积极的，并且必须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步骤，有些企业的指标，原来就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些企业的任务，主要是加强实现指标的各种具体措施，保证原定指标的超额完成；根据这一精神，检查了上半年省的计划的执行情况，认为省原定的



跃进指标是实在的、可以实现的。我們認識到，落实指标与跃进指标是統一的，落实必須是落于先进之实，落于鼓足干劲之实。落实决不允許成为松勁畏难、右傾保守的借口。在客观情况許可的条件下，只要跃一跃可以摘到手中的果子，就应该充分發揮干劲去摘取。我們及时地批判了某些干部提出的不适当地降低指标的錯誤思想，鼓舞干部和群众繼續发揚冲天干劲，防止产生松勁情緒。“气可鼓而不可泄”。由于我們对完成跃进指标采取了坚定态度，不断地鼓舞干部和群众的斗志，因而目标明确，思想坚定，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为实现今年跃进計劃而英勇奋战，使工业战綫一直保持着繼續跃进的形势。

今年安徽省工业生产繼續跃进的过程，也就是同右傾保守思想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根据去年大跃进的經驗，认真地不断克服右傾保守思想，是貫徹执行党的总路綫和实现跃进指标的重要环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右傾是主要的危險和长期的危險，我們必須經常警惕，同右傾保守思想进行不断的斗争。在工业战綫上，右傾保守思想是在不同时期、随着不同問題而出現的。一般地說，在生产計劃完成得較好时，容易滋长自滿和“歇一口气”的情緒；在生产計劃完成得不好或遇到一些新的問題和困难需要解决和克服时，容易产生畏难情緒。这些思想情緒的实质都是右傾。如果不及及时克服，就会松勁泄气，妨碍跃进指标的实现。

今年年初，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在超额完成去年工业生产任务以后，产生了松勁情緒，他們錯誤地认为“去年苦战了一冬，今年应该歇口气”，“今年日子还长，慢慢干没有关系”，因而使工业产量有所下降。經省委大鼓干劲，強調均衡生产，防止先松后紧以后，在思想上和生产上迅速地招轉了上述情况。二月份我們遵照国家計劃制定省的跃进指标时，具有右傾思想的人，又反对我們加碼。針对这些右傾保守思想，我們及时組織了辯論，通过算細賬，坚定了干部和群众的信心，坚持了跃进計劃。

在执行計劃当中，必然会遇到許多困难，問題是我們如何对待这些困难。具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总是以孤立、靜止、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来看問題，只向后看，不向前看；只看到困难，看不到已有的和正在不断創造中的有利条件；只看到物的因素，看不到人的因素。他們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落后于群众。他們在困难面前成了矮子和懦夫，无能为力。今年三、四月間，小高炉事故一度較多，产量上不去，质量提不高，成本降不下来。这时，有右傾思想的人又跑出来給群众潑冷水。为了同右傾思想作斗争，我們加强了职工的共产主义風格的教育，強調事在人为，強調充分發揮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发动职工大搞技术革新，积极钻研創造，猛攻技术关。这样，就进一步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干劲、钻勁，使小高炉迅速获得高产优质。这就用鉄一般的事实批判了右傾思想，大大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发展。



今年下半年，我們在坚持跃进指标、深入貫徹中央关于反右傾、鼓干劲的指示，展开对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的时候，更广泛更深刻地批判了各种右傾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認識到，右傾思想和坚持党的总路綫、坚持繼續全面跃进是水火不相容的，从而更深入地掀起了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

今年以来，安徽省工业生产的情况表明，不断地反右傾、鼓干劲，对促进生产起着重大作用。在同样条件下，干劲不同，效果也就大不相同，一松劲生产立刻下降，一鼓劲生产顿时上升。有許多事情，客观条件虽然具备，但如果有右傾思想，干劲不足，死气沉沉，这也困难，那也困难，本来可以办到的事情，也会落空。相反，有很多事情，客观条件虽不完全具备，但如果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鼓足了干劲，化阻力为助力，变不利为有利，客观条件就会随着改变，本来认为难以办到的事情，也可以办到。同时，經驗又告訴我們，在有些人的头脑中，右傾保守思想十分頑固，这个时期克服了，另一个时期又可能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以这种形式出現，在另一种情况下又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現。当然，万变不离其宗，右傾保守思想終归是对生产起促退作用。批判右傾保守思想，是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經常的任务。不断地反右傾，把右傾反透，不断地鼓干劲，把干劲鼓足，这是赢得全面跃进的基本保証。

今年安徽省工业之所以能够繼續全面跃

进，还由于认真地、坚决地、全面地貫徹执行了党的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今年安徽省鋼鐵产量能够加番跃进，主要是去年大办鋼鐵中建立起来的“小洋群”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今年我們在煤炭、机械、化工、水泥、輕工等部門，也进一步大搞大中小結合，大搞“小洋群”，这样就大大地推动了这些工业部門的高速度发展。

“为着要领导，必須有預見”。我們遵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在去年大办鋼鐵中，考虑到当时任务大、時間短，既要完成当年任务、又要考虑长远发展，既要完成数量、又要保証质量的情况，根据中央提出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結合本省具体情况，决定大抓鋼鐵工业“小洋群”的建設。在貫徹中央方针时，一方面加强了对馬鞍山鋼鐵公司等大、中型企业的建設，另一方面采取“洋土結合，以洋为主”的做法。在土法炼鉄有基础的大别山区，大搞“小土群”，同时根据就原料、就交通运输、就动力、就干部、就技术的“五就”原則，在工业較有基础的合肥、淮南、蕪湖、蚌埠、馬鞍山、安庆、銅官山等城市，集中力量大搞“小洋群”。短短四个月的時間，全省就建成了八立方米以上的高炉八百多座，总容积达九千七百多立方米，使全省迅速建立起許多中、小型鋼鐵企业。这些小高炉的建成，不仅使我們超額完成了去年鉄的生产任务，而且为今年鉄产量的迅速增长打下了牢固基础。今年全省的鉄产量，小高炉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小洋群”已經全部代替了“小土群”。小高炉經過一系列的技术改



造，各項經濟指标上升很快，有些小高炉的生产技术，已經达到了大高炉的水平。在今年安徽省鋼鐵生产繼續跃进中，“小洋群”的优越性表现得十分显著。

毛澤东同志經常教导我們，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須抓住主要矛盾，他說：“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領導的、决定的作用，……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①所謂主要矛盾，也就是工作中的关键問題。去年我們大抓鋼鐵“小洋群”建設，集中全力解决了大办鋼鐵中的关键問題，因而保證了去年和今年鋼鐵生产的跃进再跃进。今年春天，省委又适时地大抓炼鋼轉炉的建設，改建和新建了四十二座三吨炼鋼轉炉，今年下半年陸續建成投入生产以后，鋼产量迅速上升，使完成二十三万吨的炼鋼跃进指标，有了可靠的保証。明年我們打算大抓化肥“小洋群”的建設，以促进农业的更大发展。

我們在貫徹执行中央关于大中小結合、洋土并举的方針中，是經過一番爭論的。当时會有两种主張：一种主張是搞大不搞小，搞洋不搞土，一味強調大的洋的产量高、质量好、成本低，單純依賴大的洋的。一种主張是搞小不搞大，搞土不搞洋，片面強調小的土的容易搞、来得快，滿足于“小土群”。省委指出这两种主張都是不全面的，都是一条腿走路而不是两条腿走路。安徽省的具体情况是矿产资源丰富，群众热情高涨，这是有利条件，是基本的方面；但是經驗缺乏，工业基础薄弱，这是不利的一面。显然，我

們既不能單純依賴大的洋的，也不能滿足于“小土群”。大型企业具有产量高、质量好、劳动生产率高等許多优点，为了加速实现工业化，集中力量建設一批現代化的大型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建設大的洋的所需投資多，建設時間长，設備不易解决，技术难以掌握，投資效果發揮慢，在時間和任务緊迫情况下，單單地指望搞大型企业是不現實的，是会妨碍發揮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而小型企业和土法生产，能够在最大範圍內、組織群众参加，适应資源分散和工业基础薄弱的特点；但又决不能停留在土法生产上，必須按照实际情况，有条件地逐步向“小洋群”发展。

根据中央“两条腿走路”的方針，結合我省具体情况，我們坚决地在鋼鐵和其他工业部門中大搞“小洋群”。“小洋群”所需投資少，建設快，設備易于解决，技术容易掌握，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費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分散的資源，充分滿足人民多种多样的需要，并迅速为国家积累資金。安徽省工业生产的实践証明，坚决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大搞“小洋群”，对加速工业的发展，意义极大。馬鞍山鋼鐵公司过去用八年的時間，只建立了中型高炉一千九百多立方米，而在去年不到四个月的時間內，全省就建立了小高炉近一万立方米。大搞“小洋群”，充分地調动了广大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打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点，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鍛

^① “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0頁。



炼了干部，培訓了大批技术力量。大搞“小洋群”，还迅速地改变了安徽省工业的布局，充分利用了分散的资源，使工矿企业密布全省。我们只要对“小洋群”在技术上不断加以装备和提高，就可以使“小洋群”逐步地发展为中、大型的洋法生产。事实证明，那种怀疑“小洋群”不合算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现在人们对“小洋群”是相信了，没有争论了，在其他工业部门大搞“小洋群”的条件也更好了。但是，事物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着的，现在我们是肯定、巩固、发展和提高“小洋群”，当条件已经成熟，事物发展到引起新的飞跃时，我们就应当分别地分批地把“小洋群”发展为中、大型的洋法生产。我们必须有这种精神准备，也必须为这种新的飞跃积极创造条件，这也就是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进一步贯彻。

今年安徽省工业之所以能够继续全面跃进，还由于实行了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

在工业生产中要实行集中领导。社会主义工业是一个整体，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一环扣一环，一处发生故障，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领导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建设，好像指挥现代作战一样，战斗既紧张，兵种又复杂，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特别是组织以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在生产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厂矿单位多，分布面广；原材料供应量大；运输任务重，运量大和运力小的矛盾非常突出；电力供应跟不上生产飞速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

就会影响生产的不断发展。而这些问题，牵涉的部门很多，范围很广，只有实行集中领导，统一安排，才能解决各种矛盾，保证共同跃进。

安徽省在实行集中领导方面，省、地、市委都成立了工业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各个工业部门的生产和工作。在加强集中领导时，着重“三大抓”：一是大抓原材料的供应，大力组织矿石和煤炭的开采，加强对生产的检查督促，实行统一调度，广泛组织协作；并大力组织运输，为此，成立了运输指挥部，统一调度运输工具，分别轻重缓急，逐日进行安排，解决各部门之间在运输方面的矛盾。二是大抓重点建设，根据不同时期生产的发展，集中力量突击重点。去年大建小高炉，全省由上到下都成立了冶金指挥部；今年大搞转炉建设，又成立了钢厂建设指挥部；明年准备着重搞化肥厂建设，现在又成立了化肥建设指挥部。这样，一个时期抓一个重点，集中优势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一个个突击，问题一个个解决，就大大地加快了建设速度。去年四个月内建成八百多座小高炉，今年六个月内建成四十二座三吨炼钢转炉，生动地说明了这是取得不断跃进的一种好办法。三是大抓对薄弱环节的领导。在工业生产中，经常出现一些薄弱环节，我们一发现这种情况，便立即采取措施，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组织专门工作组深入现场，帮助工作，派负责干部坐阵督战，务必扭转局面，保证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实行集中领导，不仅不削弱下级的领导，不妨碍下级的积极性，相反地，大



大加强了下级的领导，调动和发挥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在领导工业生产中，既要集中领导，又要大搞群众运动。高度的集中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激发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推动生产的蓬勃发展。安徽省在去年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今年进一步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广泛开展了以“高产、优质、低耗、安全”为中心的红旗竞赛运动，掀起了一浪高一浪的竞赛热潮。

在大搞群众运动中，我们进行了“鼓”“比”“革”“管”“巩”五个方面的工作。“鼓”就是不断鼓干劲，大讲形势任务，组织大鸣、大放、大辩论，批判各种右倾错误，使广大群众树立和巩固力争上游的思想，经常保持饱满情绪和旺盛斗志。“比”就是在组织竞赛时，不仅比干劲，还要比钻劲、比创造；不仅比数量，还要比质量、比节约、比成本、比克服困难、比自力更生；不仅比小面积高产，更要比大面积丰产；不仅比生产大丰收，更要比思想大丰收。“革”就是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发动工人苦干结合巧干，学技术、钻技术、攻科学、动脑筋、找窍门，帮助新工人提高技术，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三结合，共同研究解决本企业生产的关键问题。“管”就是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通过群众

运动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有利于生产发展的规章制度，不断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以保证均衡生产，保证高速度发展。“巩”就是不断巩固群众的劳动热情，干部坚持经常参加劳动，亲临生产第一线，深入生产中去领导生产，深入群众中去领导群众，并密切关心群众生活，了解群众需要，与群众同脉搏、共呼吸，及时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使群众干劲经久不衰。

在大搞群众运动中，广大群众显示出无比巨大的威力和无穷无尽的智慧，许多厂矿企业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一经群众讨论，就很快得到了解决；许多原来认为无法克服的困难，只要依靠群众，就很快克服了。安徽省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推动了生产的全面跃进，不断地创造了奇迹。

一九五九年安徽省工业生产的形势虽然很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有缺点，我们的经验还不够丰富，工业生产的发展还不够平衡，当前生产中，有些问题尚待我们努力解决。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将更进一步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把右倾思想彻底反掉，把干劲鼓得更足，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积极作好生产准备工作，争取明年的继续跃进。



路是人走出来的

——記大理白族自治州凤鸣人民公社

欧 根 楊 眞 慰 陈 渭 庚
張 春 虎 李 澤 藩 兰 炳 丞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凤鸣人民公社成立才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建立起拖拉机站，发展了农、工、林、牧等业及各种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的生产。一个多灾多难的贫困地区，现在已经变成牛羊成群、鱼鸭满塘、粮食满仓的富饶之乡。各族人民亲身体会到，人民公社的确像早晨的太阳一样，为他们照亮了通向幸福的大道。

再不能那样“小合作”了

凤鸣人民公社，是一九五八年六月由原凤仪县全县和下关市郊区共二十四個高級社合并成的(当时叫大联社)。一九五九年八月，为了使郊区更好地为城市服务，又将下关市郊区划出，另成立郊区公社。现在凤鸣公社有九千四百七十六户，四万三千三百零七人，七万八千六百四十二亩田地，大部分是平坝，也有山区和半山区。这是一个多民族联合的公社，有白、彝、汉、回、傈僳等五种民族，其中以白族为主，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二；傈僳族最少，只有十三户，一百一十三人。一九五六年初，原凤仪县建成二十一个高級社，实现了高級合作化。一九五

七年底，在党中央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偉大号召下，各族人民很快就掀起了一个热火朝天的生产高潮。要实现农业大跃进，就必须大修水利，大办地方工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在这些任务面前，原来的高級社就开始暴露出規模小、土地少、人力物力财力单薄等一系列和大跃进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于是，各社的社員和干部就紛紛要求把各社联合起来。

促使許多高級社联合起来的，首先是兴修水利的运动。凤仪县是个旱、涝灾害比較严重的地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就希望在波罗江上游修个大水庫，根除旱涝灾害。但是这个水利工程需要破土几十万立方米，筑三十多米高的大壩，单靠一个高級社或几个高級社的力量是修不起来的。而且修的时候，需要占用三哨高級社八百多亩好田，还得移走两个小村。因此，虽然在一九五六年就有人提議修这个水庫，却一直没有修成。大跃进的号角响起来以后，各族农民为了尽快地摆脱“一穷二白”的状况，都願意联合起来，共同修建这个水庫。三哨高級社的汉族农民說：“既然能解决坝区十几个合作社的灾害問題，占去八百亩田不要紧，我們再到山上开荒



去。”壩区的白族农民，主动划出四百多亩好田給三哨。大家还願意帮助需要迁移的两个村落另建新村。山区的彝族和傣族农民虽然用不上水，也願意出人支援。他們說：“只要壩子上增产，我們山区也会很快地发展起来。”在各族农民的要求下，县委决定組織全县二十一个高級社联合修三哨水庫。一說修水庫，很快就集中了四千多人。到一九五八年夏初，水庫就开始发挥作用。各族农民看到，单个高級社办不到的事，联合起来就办到了，因此，要求联合起来大修水利的勁头越来越大。海东、海南等四个高級社要联合修老太庙水庫。凤仪县的凤鳴和下关市的福星等五个高級社，要联合修凤鳴水庫。錦阜、芝华等四个高級社的男劳动力去修三哨水庫还没有回来，妇女們就要联合起来修个“三八”水庫。大修水利的高潮把社界、乡界、县界一齐冲破了。

大跃进的形势步步逼人。水利工程还没有完成，緊張的栽插季节又快到了。時間紧，任务重，劳动力不足。两面同时作战，哪一个高級社都有困难。这时，大家一面考虑在栽插中互相协作，一面就开始想到购置农业机械的問題。就在这个时候，下关运输总站保养厂試制成功一台拖拉机，在凤仪县石龙村試犁。各族农民听说“鉄牛”犁田，男女老少都赶着去看。“鉄牛”犁得又快又好。人們看到，有了拖拉机，就可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問題。可是，单靠一两个高級社的力量，又怎能买得起拖拉机呢？于是，他們很自然地想到“联合起来”。一九五八年四月中旬，在全县干部會議上，有人就提出联合办大社的問題。会后，海东、海南、江西、三哨、后山、石龙、滿江等許多高級社又正式向县委提出

并社的要求。海东、海南的四个社湊錢到昆明去买汽車；江西、后山、三哨三个社也联合到祿劝县去买籽种，还联合起来修了一条从江西白族地区直通后山彝族地区的十多公里长的公路。由几个高級社和几个民族联合办的农具工厂也出现了。事实上，群众的这种行动已經不只是简单的劳动协作，而是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进一步改善生产关系。

大跃进的形势发展得很快，群众的要求越来越多。联合起来发展生产，已成了必然的趋势。当时，县委的领导同志中多数人坚决支持群众的要求。也有少数人反对联合修水利。他們說，联合修水庫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偷鸡不着蝕把米”。另外还有人动摇于两者之間，既感到联合办大社是大势所趋，不办不行，又怕沒有机械，大社办不成。

当时，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已經开始。大修水利、大积肥料等一系列活动很快就在各地搞得热火朝天。那些动摇犹豫的同志，經過一番观察和考虑以后，也轉到积极支持群众运动的方面来。而反对兴修水利的县委委員范錫功，却在海东、海南一片地方，和少数富裕农民連成一气，压制群众大跃进的行动。群众要掀掉老太庙修水利（这个庙修在出水口上面）。富裕农民楊錫鈞說：“掀不得。掀掉管水的老太神，水出不来。”范錫功也对干部說：“干不得，干了会脱离群众。”楊錫鈞說：“不要心大压着肺。”范錫功也說：“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想得好，就是做不到。”但是群众要求联合起来搞大跃进的热情，却越来越高，誰也阻擋不了。县委书记陈凤照同志，代表县委向群众明确地表示了支持他們的态度以后，群众情緒更加沸騰起来。他們



說：“天鵝肉也是人吃的”，“路是人走出來的”，“只要有毛主席領導我們，就是地塌了，我們也有本事修補起來。”文武高級社黨支部書記楊富業（白族）帶頭把“老太神”砍倒，接着二、三百人沖上去，一下子就把老太廟全部掀掉，放出一股活龍潭水來。各村群眾聽見這個消息，紛紛自帶工具、行李趕來參加，幾天之內，水利工地的人馬就上齊了。

不久，那個隱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范錫功被揭發了。他不僅反對聯合修水庫，還惡毒地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斗倒這個右派分子以後，全縣幹部和群眾的眼睛更亮了，要求辦大社、走社會主義大道的決心更加堅定了。縣委會又向群眾提出“搞好生產，迎接辦大社”的號召。于是在省委、地委的同意下，經過大理市委（下關市和鳳儀縣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合併為大理市）的積極籌備，鳳儀縣和下關市郊區於一九五八年六月正式合併為一個大聯社。不久，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和“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也傳達下來，各族人民更加干劲冲天，决心以新的生产高潮迎接人民公社的成立。各族群众齐声拥护办公社。江西管理区白族农民說：“小社小增产，大社大增产，人民公社全面发展。这回毛主席領導我們又高升了一步。”山区吊草村的彝族农民听说要成立人民公社，怕壩区嫌他們产量低，全村立即昼夜赶种晚秋作物，并且催支部书记翟鈞赶快下山，向壩区农民提出保證：“山上的彝族决不落后，我們的单产虽然达不到千斤，可以多开些荒，每人平均粮食要赶上你們。”住在高山上的傣族农民，也派代表赶下山來，要求全部加入公社。两三天內，各

族农民就写了成千上万張大字報、申請書、保證書、决心書，要求參加人民公社。于是大聯社就正式改組為鳳鳴人民公社。这是白族地区第一个人民公社；它对于自治州迅速实现公社化，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穿心江”变成了“幸福江”

鳳鳴公社三面环山，北临洱海，波罗江从南往北，两岸是个狭长的小壩子。解放前，由于水利失修，水土流失严重，波罗江越来越小，壩区五万多亩土地就有四万多亩因缺水而不能按时栽插。处于波罗江下游的鳳鳴鎮、石龍、滿江等地区，几乎每年都有二万多亩稻田要改种旱谷，而雨季一到，山洪暴发，沿江两岸的几万亩稻田又要遭洪水淹沒。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上下游各民族之間常为爭水鬧糾紛，以至发生流血慘劇。云乐村的“閻王壩”就是个打死人不償命的地方。各族农民一提起这条江，就如尖刀穿心，多年来都把它叫做“穿心江”。

解放后，年年治理，波罗江两岸的情况已經逐步好轉。到一九五七年，灌溉面积就增加到四万二千多亩，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多。但是沿岸仍有一万多亩稻田因缺水灌溉，不得不种旱谷。遇到特大的洪水，还不能控制。大跃进和公社化以后，公社統一調配劳动力，用了三十八万多个工日，修建中型水庫四个、小型水利工程一百四十多处，增加灌溉面积达二万七千四百六十一亩，等于解放七年来所修水利总和的一点八倍。目前，全部灌溉面积达六万九千多亩，基本改变了“十年干旱九年涝”的面貌。能蓄水一千二百万立方米的三哨水庫，已完成工程量的



百分之六十。这个水庫建成后，既能把波罗江上游的特大洪水全部拦蓄起来，又能在干旱时期保证三万多亩稻田的灌溉，对壩区十个管理区的增产有着决定的意义。一九五九年春耕期间，这个未完的工程所蓄水量就已经灌溉了一万九千多亩田，使下游的凤鸣、石龙、浦江等管理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芒种”时基本结束了栽插。乐和管理区慈航村，过去干旱严重，每年群众都要作三套准备：先是种旱谷，旱谷干死了，改种包谷；包谷干死了，改种蕎子。一九五八年实现水利化以后，能够按季节栽插，每亩水稻产量达到六百斤，比过去增加了五倍，缺粮村一下变为余粮村。海南管理区在水利建设高潮中，从下河村挖了一条八丈宽二十里长的排水沟到洱海，使一个八百多亩大的烂泥塘变成了良田，一九五八年大春净增稻谷四十多万斤。这个每年缺粮达二十万斤的穷地方，一下子就变成了余粮区。

现在，凤鸣壩子已变成鱼米之乡。“穿心江”已成“幸福江”。

一九五八年，全公社粮食增产了百分之二十三点四，每人平均有粮食一千一百二十六斤。一九五九年虽然遭到连续七个多月的干旱，小春粮食单产仍然由一九五八年的二百二十多斤提高到二百七十多斤。据公社党委估计，全年粮食产量可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九左右。各族社员眼看着大片稻谷穗大粒饱，高兴地说：“这样大面积的好谷子，从来没有见到过，真是一籼谷子一籼米的好年景！”普和村白族农民赵贵田的妈，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眼睛早已失明，她到田边摸摸沉甸甸的谷穗，又摸摸满沟的流水，说：“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公社真好，过去是各民族

为水打架，现在是团结修水利。”

老牛换成拖拉机

“人民公社力量大，又盖工厂又发电，老牛换成拖拉机，决心实现机械化。”各族人民这样歌唱着人民公社成立后的新景象。

原凤仪县在工业生产方面，几乎是一张白纸。壩区的白族、汉族农民只经营一些手工业。山区的彝族、傣族，除了砍木料、织麻布以外，没有其他手工业，农具坏了，还要拿到几十里路外的下关去修理。大跃进以来，各族人民都迫切要求买一些大型的农业机械，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但是在高级社的时候，买不起拖拉机。江西高级社白族农民有电力，有铁匠、木匠和一定的技术设备，就是因为资金不足，燃料、木料缺乏，想建立个农具厂也建立不起来。后山彝族的高级社虽有丰富的燃料、木材，但因没有铁木工和技术设备，建立工厂就更加困难。

公社建立以后，党委根据各民族的共同要求，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大办农具制造修配、建筑材料、农副产品加工和日用品加工等四类工业，新建各种大小工厂二百三十四个。锦阜管理区住在山头上的七户傣族，也派人下壩来和白族人民合办了一些工厂。

由于公社经营项目多，收入多，积累也多，公社和管理区可以不断地从积累中提取现金，给各厂增添设备。公社给各农具厂先后添置了翻砂设备、铸件工具、鼓风机和车床等，使农具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一年来，各农具厂共制造、改良了各种农具八万六千多件，为社员修补小农具十万多件，并生产出一向依靠昆明、下关等地供应的步犁、打谷机、播种



机、压面机、碾米机、牛車、馬車等較大的生产工具。接着，公社又购买了汽車二輛、拖拉机十一台、抽水机三部、发电机五台、四行播种机八部、馬車二百六十二部和其他大型生产工具三百多件，还建立起拖拉机站、馬車运输队、小型水力火力发电站等。乐和、江西、北淌天三个村子也已經安上了电灯。

在大办工业中，通过請人来教、派人去学，先进民族帮助落后民族，老师傅带徒弟，举行現場会和組織观摩評比等办法，一年来共培养了各民族技术工人一千二百五十人。江西农具厂的白族青年工人周紹唐，过去什么技术都不会，进厂后不到三个月，就和張品松、楊傳等人一起，經過几次試驗，造出了簡易車床。这个厂的白、汉两族工人，还帮助四个彝族农民学会了打鉄、做木器的技术。彝族的社員說：“办了人民公社，我們彝家也有工人啦！”党委还特别关心少数民族女工的成长。过去是家庭妇女的白族王美英，现在是白族地区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另一个白族妇女赵秀仙，則成为凤鳴公社的第一个女机械工人。

一年来公社大办工业和购置的农业机械，已經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拖拉机在春耕期間就为耕牛不足的石龙、滿江、云乐等管理区翻犁了二千八百多亩稻田。到秋收秋种时期将翻犁一万亩左右。据公社党委会的同志說，如果再购买两部履带式拖拉机，机耕面积就可达到四万多亩，壩区可以基本上实现机耕化。馬車运输因在今春緊張的麦收季节中，四天時間就将石龙管理区的一千四百多亩小麦搶运了回来，使这个地区能够比往年提前一个多月栽完了秧。

朵朵金花放光芒

人民公社組織規模大，活动范围广，有条件做到統一规划、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經營。根据这一特点，公社党委从公社建立时起，就注意发挥各民族的特长，組織他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大兴林、牧、副、漁各业。

海东、海南管理区是馳名国外的大理雪梨的主要产地。这里的白族人民已有几百年的植梨历史。解放后，梨产量虽然年年增加，但速度比較緩慢。公社成立后，才开始大量培育树苗，供应各管理区嫁接。仅海东管理区梨园面积就增加了一千亩，等于解放后七年内增加面积的两倍。公社化后，管理区又統一調配劳动力管理梨园，使一九五九年雪梨获得了大丰收。仅此一項，全管理区就可收入七万多元，平均每戶七十元，比公社化以前增加了一倍多。

滿江管理区紧靠洱海，这里的白族人民擅长捕鱼。过去由于資金困难，劳力不足，只捕不养，产量不大。公社化后，修建起了育苗魚塘和商品魚塘；公社又从后山、华营等产麻区調来一部分麻供他們編織和修补魚网。一九五九年該区的魚产量可以达到三万多斤，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将近两倍。

彝族聚居的后山管理区，是个山区，有山、有水、有草場，彝族人民又有育林和养羊的經驗，很适于发展林业和畜牧业。但是这里只有一百三十多戶，二百四十个劳动力，生产技术也很落后。过去是顾了粮食生产，就顾不了别的。现在公社确定这里主要发展林业和畜牧业。一年来，这个管理区除了护育山林以外，还开辟了梨园、茶园、核桃园、花



椒园、棕树园，共种植了十多万棵树。养羊方面，除了自用和出卖的一百多只以外，现有山羊、绵羊共八百九十只，比公社化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四。

住在江西管理区海拔二千三百多米高山上的六户傣族，解放前到处飘泊，解放后才在这里定居下来。公社化后，管理区根据他们长期种山地和牧羊的习惯，要他们多种包谷多养羊。一年来，他们的羊已由一百一十只增加到三百三十六只，牛由十八条增加到三十二条。彝族、傣族人民说：“公社真好，会做梁的做梁，会做柱的做柱，有气力都使得出来。”

现在公社已建立起一个畜牧农场，购买了荷兰牛、约克夏猪、高加索羊、安哥拉兔等新品种，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和改良牲畜。目前全社牛、马、驴、骡等大牲畜已发展到一万一千八百头。公社还根据集体饲养和社员私人饲养相结合的方针，大力发展养猪、养鸡、养兔、养蜂等副业生产。目前每户平均养猪二头多、鸡九只、兔二只。

这里的名产“赵州丝”，在公社成立以后，也得到了发展。城镇的汉族居民，有养蚕、缫丝、做丝线的手艺，他们做的丝线为滇西一带白族、彝族、傣族、纳西族妇女所喜爱。公社成立了蚕桑农场，同时还在凤鸣镇、石龙、乐和、江西、锦阜、满江等管理区发动群众种桑养蚕，今年可产茧三千斤以上。

公社化以后，农、林、牧、副、渔各

业并兴，农村经济十分活跃。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也大为发展。一九五九年一月到八月，全社商品生产部分占全部生产产品的百分之六十，商品销售额共达一百九十二万三千元。目前，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下关市三万多人口所需的猪、鸡、兔、鱼、蔬菜、水果等食品，主要就是靠着这个公社供应的。各族社员都欣喜地说：“公社化以后，朵朵金花都大放光芒。”

(注：这个材料是作者在1959年9月调查的)



向湖塘要肥料(木刻)

彭志雄



关于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若干问题

——对胡钧同志的“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一文的商讨

关 梦 觉

胡钧同志在“红旗”一九五九年第十二期上所发表的“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一文，主要论点是否认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着商品价值关系，他特别着重地说明了国家卖给国营企业职工的消费品并不是商品，仅有商品的“形式”，在这里，并不存在着真正的商品关系。所有这些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固然都值得进一步地展开讨论；但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钧同志对于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问题的看法，本文主要就是想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只是附带地涉及到一些其他问题。

一、关于劳动交换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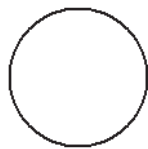
因为胡钧同志是以劳动的等量交换或不等量交换作为自己全部论点的基础的，所以我们先从这个问题的谈起。

胡钧同志认为人们之间生产劳动的交换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商品交换关系，即通过物与物的交换来实现的劳动交换，在这里，“生产者是在物的形态上，把自己的劳动当作等量的人类劳动来进行劳动的交换。而人们借以实现其劳动交换的物品就是商品”；另

一种是非商品交换关系，即直接的劳动交换关系。这两种劳动交换关系的最本质的区别，据说乃在于商品是“有物”的，而直接的劳动交换则是“无物”的。在胡钧同志看来，这种区别之所以带有关键性，乃是因为以物为“纲”的劳动交换、即商品交换，由于“生产资料的优劣所带给劳动者劳动效率的影响”，以致“不管实际劳动消耗怎样，等量等质的物品就只能在市场上换得同量的其他物品”，而“实际上，具有同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在同种的等量的物品内耗费的实际劳动往往是不同的。”这就是说，商品交换，实质上并不是等量劳动的交换，而是不等量劳动的交换；只有不以物为媒介的劳动交换、即直接的劳动交换，才是等量劳动的交换，“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抛开生产资料质量的影响，而只核算劳动本身的质量和数量。”

我认为，胡钧同志以“有物”或“无物”为分界线，把商品交换和所谓直接的劳动交换互相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是值得研究的（至于商品交换是不是等量的劳动交换，以后再谈）。事实上，劳动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是生产领域中的劳动交换，即在



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交换或劳动者互相交换其活动。这种劳动交换是生产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马克思说：“在生产本身中实现的活动与能力的交换，显然是直接属于生产并且构成生产的本质的东西。”①“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自己也互相影响着。他们如果不用相当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从事生产。”②只有这种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的劳动交换、即活劳动的交换，才不采取物的形态。但胡钧同志所说的不采取物的形态的劳动交换，并不是指此而言的。

第二，是交换领域中的劳动交换，即商品交换。恩格斯说：“根据平等估价的原则，以劳动交换劳动”——这句话如果有意义的話，那么，它就是說，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可以相互交换。”③（着重点是引者加的）这种“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的互相交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等价交换。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劳动交换，必须通过物的形态，或者说必须以物为媒介来进行。把这种不言而喻的事情，说成是商品关系的最本质的东西，不仅有“见物不见人”（商品交换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嫌疑，而且也未免有点小题大作了。

第三，是社会主义分配领域中的劳动交换。胡钧同志所说的直接的劳动交换，就是指此而言的。他认为“这里的劳动交换不会是在物的形态上进行的，而是一种直接的劳动交换”。其实，从分配的角度来看，任何的劳动交换，归根结底，都是物化劳动的交换，而不会是活劳动的直接交换。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在物的形态上所进行的

劳动交换，究竟采取什么具体形式——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呢，还是通过产品的直接分配来实现呢，那要由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条件来决定。但无论如何，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这种劳动交换终究是要通过物来实现的。马克思曾认为有两种分配：一种是生产产品的分配，即消费品的分配；另一种是生产要素的分配，这种分配是包括在生产之中的。④恩格斯说：“分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被分配的产品数量”。⑤可见分配就是劳动产品的分配，而工人们所首先取得的货币工资，不过是社会劳动产品的一般等价物而已。在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还存在着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尽管劳动已经不是私人劳动，而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但这种直接的社会劳动还必须利用价值和价值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即还要经过迂回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不能认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就必须进行直接的劳动交换。胡钧同志预先断定在物的形态上进行的劳动交换是不等量的，所以才说等量的劳动交换不是在物的形态上进行的，而必须是直接的劳动交换。其实，劳动的等量交换和在物的形态上进行的劳动交换，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劳动的等量交换是内容，在物的形态上进行交换是形式，内容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1页。
- 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4年版，第67页。
-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0页。
- ④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2页。
- ⑤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5年版，第487页。



和形式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統一的。

总括以上所說，可見除了在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直接交换以外，無論在交换领域中或在分配领域中，生产者之間的劳动交换都必须通过物的形态来进行，即都必须通过产品来实现。

胡鈞同志的全部論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面的：商品交换是在物的形态上进行的，而直接的劳动交换(即分配)則是不通过物的形态来进行的。既然这个前提本身成了問題，那么胡鈞同志的全部論断也就失掉基础了。胡鈞同志认为等量劳动交换与不等量劳动交换的“分界綫”就在于一个“物”字(“有物”或“无物”)，但事实上这两种交换都是同“物”分不开的，于是胡鈞同志的“分界綫”也就被突破了。

二、关于商品的等价交换問題

現在我們再进一步地考察一下胡鈞同志对于商品交换問題的看法。

胡鈞同志說：“通过物的形态进行劳动的交换，交换双方所关心的就必然只能是生产物之間的比例关系，等量的同种物品就被看作是相同的等量的劳动。不管实际劳动耗費怎样，等量等質的物品就只能在市場上換得同量的其他物品，这是商品关系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实际上，具有同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在同种的等量的物品內耗費的实际劳动往往是不同的。影响这一点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由生产資料的优劣所帶給劳动者劳动效率的影响。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同等熟練程度和劳动强度的劳动者，会因技术

装备的好坏而花費不同量的劳动，因而在每件产品上就实际上凝結着不同量的劳动。”这就是說，由于生产資料的优劣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等量同类商品包含着不等量的劳动，而在市場上却实行等价交换，因而这只是形式上的等价，而實質上却是不等价的。簡言之，真正的等价交换——即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的交换，或以商品价值为基础而进行的等价交换——實質上是并不存在的。

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等价交换，就是商品的交换必須以它們的价值(即社会价值)为基础来进行，而商品的价值則是由它們在生产中所耗費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以劳动時間計算)来决定的。因此，商品的等价交换，實質上也就是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与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簡言之，就是劳动的等量交换。我們前面引証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說的一句話：“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之可以相互交换”，就是指此而言的。

在这里，有两个問題往往会引起对于等价交换的怀疑，需要加以說明：

(一) 商品的价格与价值背离同等价交换的关系問題。商品交换毕竟是通过商品价格之間的比例关系来进行的。但参加交换的商品的价格，在以价值为基础的条件下，却又可能与它們的价值发生某些背离。就是对于社会主义的計划价格來說，这种情况也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例如甲商品的价格高于它的社会价值，乙商品的价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这两种互相交换的商品由于它們的价格与价值依相反的方向发生背离，所以好像不是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与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我們能不能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价格与价值发生某些背离，就认为商品的等价交换原来不过是一种空中楼阁呢？当然不能。第一，商品的等价交换是以它们的价值为基础而进行的交换。尽管某些商品的价格与价值发生一定的背离，但这种与价值相背离的价格，仍然是以价值为基础的，按照这种价格进行的交换，仍然是等价交换。等价交换，是价值规律对于商品交换的一般的要求，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两种互相交换的商品都必须分毫不差地各自按照它们的价值来进行交换。等价交换，同其他许多社会现象一样，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第二，等价交换是就整个的商品“界”来说的，这并不排斥个别的商品在交换中发生不完全等价的情形。但整个说来，这种情形是可以互相抵销的。某几种商品互相以高于其价值的价格或低于其价值的价格交换的情形，不但是常常换位，而且是相对相消的。结果，还是归结为一个总的等价交换。价格与价值背离，是等价交换过程中的偏差；等价交换，又会使这些偏差互相抵销。背离是局部的现象，等价交换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不能因为看到局部的现象，就否认了客观规律。

(二) 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背离同等价交换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说：“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那就是，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由各个场合生产家实际费去的劳动时间来计量，而只由该商品生产上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计量。”^① 所以，商品的等价交换是指商品按照其社会价值（或以社会价值为基础）所进行的交换，或者说，是社会必要劳动的等量交换，而并不是指商品按照其个别价值所

进行的等价交换或个别劳动的等量交换。可是，因为“一个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其内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例，与实现在其内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例”^②，所以，由于各个生产单位的劳动生产率有高有低，商品的个别价值（由个别劳动消耗量所决定的价值）也就有的高于其社会价值，有的低于其社会价值。但商品交换总是以其社会价值为基础来进行的。于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就能够在其产品的个别价值以上出售，从而获得一个额外收入；反之，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就得在其产品的个别价值以下出售，从而就有一部分价值（超过社会价值以上的那部分个别价值）不能实现。然而上述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商品的等价交换。等价交换，正是以商品的社会价值为准绳，来矫正其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背离；也就是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消耗为准绳，来矫正商品生产中的个别劳动消耗与社会必要劳动消耗的背离。等价交换，正如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的一样，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就整个商品“界”来说的，并不是专就某些个别的商品来说的。

在上述这两种背离中（即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和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背离），胡鈞同志正是抓住了后一种背离，来否认商品交换是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的交换，而否认这一点，实质上也就是否认了商品的等价交换。为什么胡鈞同志会有这样一种见解呢？这就是因为他把等价交换看成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7—378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



商品按照其个别价值(个别劳动消耗)所进行的等价交换,而不是按照其社会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消耗)所进行的等价交换,并且把等价交换看得绝对化了。

现在我想和胡鈞同志商讨一下:商品按照其不同的个别价值所进行的等价交换(如果有的话),实质上是不是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呢?

马克思在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结晶于这个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的时候,曾举例说:“在英国,当汽力织机已开始来和手织机相竞争时,为了把一定量的纱转化为一码布或一码呢子,只需要使用原先劳动时间中的半数时间。诚然,可怜的手织机织工,现在已不是如从前那样每天劳作九小时或十小时,而是每天要劳作十七至十八小时了。但是,现在这织工二十小时劳动的生产产品中只包括有十小时社会劳动,或十小时为了把一定量的纱转化成布时所必须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这个织工现在二十小时劳动的生产产品所包含的价值,并不多于他从前十小时劳动的生产产品所包含的价值。”^①根据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分析两种情况:

(1) 现在纺织工业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显然是由使用机器的织工们的劳动生产率来决定的。(机器织工的个别劳动符合于社会必要劳动)如果用手织机织工二十小时的个别劳动(等于十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去交换机器织工二十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交换是通过货币来进行的),那实质上就是用十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去交换二十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这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20=20”,而实质上却是“10≠20”。所

以,这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但实质上却是不等量的劳动交换,也就是非等价交换。

(2) 反之,如果现在用手织机织工二十小时的个别劳动(等于十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去交换机器织工十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那实质上就是用十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去交换十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这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20≠10”,而实质上却是“10=10”。所以,这从表面上看来,好像不是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即非等价交换;但实质上却是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即等价交换。

由此可见,所谓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是指社会必要劳动来说的,并非指个别劳动来说的。手织机织工用二十小时的劳动去交换机器织工十小时的劳动,从现象上看,好像不是等量的劳动交换;但从本质上看,却是等量的劳动交换,也就是商品的等价交换。在这里,现象和本质是不一致的。胡鈞同志大约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才否认商品的等价交换是等量的劳动交换。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个别的劳动消耗与社会必要劳动消耗的矛盾,以及反映这种矛盾的社会的等价交换与个别的不等价交换的矛盾,是推动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消耗的动力之一。既然商品交换是按照社会的等价进行的,因而个别企业的产品的个别价值如果高于其社会价值,它们个别的劳动消耗

^①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4年版,第399页。



如果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消耗，那么，它们在交换中，就会补偿不了它们的劳动消耗（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它们就会在等价交换的行列中“掉队”。而且，等价交换中的“等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某个企业的产品的个别价值符合于其社会价值，但明天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同类产品的社会价值降低了，如果这个企业还是故步自封的话，那么它的产品的个别价值就要高于其社会价值，于是就要在等价交换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所有以上这些情况，可以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使落后的企业赶快摆脱落后状态，使先进的企业继续前进。可见等价交换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非常有益的。反之，如果我们按照商品的个别价值去进行“等价”交换，按照个别的劳动消耗去进行“等量的”劳动交换，那倒可以使落后的企业高枕无忧，安于现状。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害的。

三、关于按劳分配问题

胡钧同志除了对于等价交换问题有某些误解以外，对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某些看法也是可以商讨的。

胡钧同志说：“在这里工人所领得的货币，并不是与他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直接相联系的。从经济关系上来说，它不是工人所创造的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内，货币并不是作为一般等价物来衡量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下列事实可以说明：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同质的同种的劳动，虽然由于设

备好坏的不同，会制造不同量的产品，从而创造不等量的社会价值，可是他们却得到同量的货币工资。在这里，同量的货币丝毫也说明不了工人创造的社会价值是多少和是否相等。这明显地表明：在这个关系中，货币并不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的证明，而只是劳动者贡献给社会的一定的劳动量的证明。由此可见，把职工用工资去购买消费品，说成是职工与国家的等价交换关系也是不恰当的。……这里同量的货币并不代表等量的价值，但它却能购买等量的消费品。”

为了便于讨论起见，首先应当明确：这里胡钧同志所说的“同质同量的同种劳动”是指社会必要劳动来说的，而工人们“得到同量的货币工资”，就是这一点的证明。甲汽车厂与乙汽车厂的七级工，虽然两个工厂的设备好坏有所不同，但却都是被社会所承认的同一级的熟练工人。这和我們前面所引证的机器织工与手织机织工的差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胡钧同志在上述那段话中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同质同量的同种劳动，在同一时间内会创造“不等量的”价值，但却可以得到同量的货币工资，这算不算是“按劳分配”呢？如果说按劳分配并不反映工人们所创造的价值，那它还有什么物质基础呢？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说，由于劳动生产率不同，尽管同样的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不同数量的使用价值，但却创造同量的价值。马克思写道：“生产力无论怎样变化，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总是产生等量的价值。但它在同一时间内却会产生不等量的使用价值，当生产力上升时就会更多些，当生



产力下降时就会更少些。同一的生产力变化，一方面固然可以增加劳动果实，从而可以增加由这个劳动所产生的使用价值量，但同时却又可以减少这个增加了的使用价值的总价值量，假如这种生产力的变化会缩短了这些使用价值在生产上所需要的全部劳动时间的話；反过来，也就相反。”^①根据这个原理，两个同时并存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尽管劳动生产率有所不同，但同質同量的同种劳动，在同一時間內，却創造等量的价值。因此，这些工人依照按劳分配的原則获得同量的货币工資，是与他們各自所創造的价值量相适应的（相适应并非相等）；也只有与工人們所創造的价值量相适应的消費基金的分配，才能說得上是按劳分配。

假定有两个使用“同質同量的同种劳动”的企业，但劳动生产率不同。在这里，劳动生产率較高的企业之所以能够通过商品交換而获得更多的收入，这并不是因为它在同一時間內創造了更多的价值，而是因为它实现了更多的价值。这个多实现的价值来源，是由社会上其他企业的劳动者所創造而由它所占有的——当然，归根結底，还是归全民所有。反之，劳动生产率較低的企业工人，在同一時間虽然也創造了同量的价值，但却有一部分不能由它自己来实现。所以，在同一時間內創造同量价值的这两个企业的同样的工人，获得同样的基本工資（奖金除外），这正是体现了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換的原則、即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則。反之，如果两个企业的同样工人創造同量的价值而获得不同的工資，或如胡鈞同志所說的創造不同量的价值而获得同量的工資，那倒是違反

按劳分配的原則了。胡鈞同志否认按劳分配是以工人們所創造的价值为基础的，那实际上等于否定了按劳分配本身。如果說按劳分配并不是以工人們的劳动成果（他們所創造的价值）为根据，那它岂不是成为架空的东西了嗎？

在这里，胡鈞同志大約是忽略了一些不同的范畴的区别：

第一，他对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区别，注意得不够。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尽管同样的劳动在同一時間內所創造的价值量是相同的，但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却有所不同。当使用价值量增加时，每件产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就相应地减少了；反之，当使用价值量减少时，每件产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就相应地增加了。我們不应当把使用价值量的增减看成是价值量的增减。（不过，应当特別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最少量的劳动消耗取得大量的使用价值，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第二，他对于劳动創造价值与劳动轉移价值的区别，注意得不够。同样的劳动在同一時間內，由于劳动生产率不同，尽管所創造的新价值是相等的，但所轉移的旧价值、即生产資料的价值，却有所不同。劳动生产率高，所轉移的旧价值就多些；劳动生产率低，所轉移的旧价值就少些，不可以把二者混为一談。

正因为胡鈞同志忽略了以上这些区别，所以他才认为：“同質同量的同种劳动，虽然由于設備好坏的不同，会制造不同量的产品，从而創造不等量的社会价值，可是他們却得

^① 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20頁。此處譯文，引者根据恩格斯所編的英譯本第33—54頁，略加更動。



到同量的货币工资。”我认为应当这样说：同质的同种的劳动，虽然由于劳动生产率不同，在同一的时间内会生产不同量的使用价值，但却创造同量的价值，所以他们才获得同量的货币工资。只有这样，按劳分配才有现实的基础。

除了上述这个基本问题以外，胡钧同志对于货币工资的理解，也是值得商讨的。他认为：作为职工工资的货币，“并不是作为一般等价物来衡量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同量的货币并不代表等量的价值”，所以，货币“只是劳动者贡献给社会的一定的劳动量的证明。”总之，胡钧同志认为按劳分配之“劳”，并不反映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因而作为工资的货币也就不是一般等价物，而只是劳动量的“证明”。

事实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职工工资的货币，同其他货币一样，都是一般等价物，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蓄手段、支付手段等各种职能。当我国国营企业的职工们，通过分配的途径，获得货币工资的时候，从国家来说，这种货币尽了支付手段的职能；从职工来说，则取得了一般等价物，它代表价值、代表抽象劳动。

胡钧同志一再说，作为工资的货币只是一种“证明”或“证券”。其实，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存在的条件下，货币本身也是一种“证明”或“证券”，列宁就曾把货币称为“有权取得社会财富的证券”^①。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已经不存在了，当货币已经消亡了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的劳动“证明”或劳动“证券”，这种“证券”像戏院的门票一样，是不流通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说：

劳动者“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收据，证明他供给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收据又从社会储备中领得与其劳动量相等的那么多的消费品。他以一种形态给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态全部取回来。”^②我们应当怎样去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段常常被人引用的话呢？我认为，当商品、货币已经不存在的时候，这张“收据”就是真正的劳动券，而用这张“收据”去领取消费品的过程，就是直接的产品分配过程；反之，当商品、货币还存在的时候，这张“收据”就仍然是货币，而用这张“收据”去“领取”消费品的过程，也就是商品交换的过程（直接分配的那部分产品除外）。

胡钧同志否认国营企业职工所获得的货币工资是真正的货币，固然是为了否认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着商品关系，但这对于按劳分配也是一种误解。如果说“货币并不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的证明”，那么，用什么去表现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呢？如果说工人获得多少货币工资，并不反映他们所创造的价值量，那么，凭什么去给张三这些工资、给李四那些工资呢？这样一来，按劳分配岂不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了吗？

此外，胡钧同志对于按劳分配反映什么关系问题的看法，也是值得研究的。他说：“……就消费基金本身的分配来说，表面看来是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实际上它首先直接是国营企业全体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是劳动

① “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5年版，第21页。



者彼此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这种看法也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国营企业职工关于消费基金的分配，既表现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表现生产者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因为国家就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不仅要决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这一点，胡钧同志是承认的），不仅要全部社会产品中扣除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保险基金；而且还要从剩下的全部消费基金中扣除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一般的不属于生产的管理费用”、“作为共同满足需要的费用”，以及“为丧失劳动力者设立的基金”等。不仅如此，就是在个人分配的过程中，怎样分配、采用什么形式分配等等，也涉及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列宁曾经指出，在国营企业中，全体工作者都隶属于国家。但是雇佣形式在这里所表现的不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不是资本家购买无产者的劳动力，而是各个工作者和社会主义国家所代表的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①（着重点是引者加的）既然如此，又怎能认为消费基金的分配只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不涉及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呢？承认消费基金的分配包括双重关系：既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又包括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承认在分配问题上，既要正确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又要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只有这样，才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利。

四、关于交换与分配的关系问题

交换和分配都决定于生产，首先是决定

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形式。马克思说：“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和交换，以及这些不同的要素相互间的一定的关系。……在不同诸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凡是有机的整体总是这种情况。”^②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既不能把交换和分配互相混淆起来，例如用分配去代替交换；也不应当把两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交换与分配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而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存在的条件下，分配更不能离开交换而孤立地存在，在大多数的场合，消费基金的分配是借助于交换而最后实现的。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胡钧同志对于交换与分配的关系问题的意见：

（一）胡钧同志在某些地方，把交换和分配混淆起来了。例如他说：“假如说，职工向国家购买消费品是国家与个人间的商品交换关系，那就是说双方是等价交换。可是，假若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与国家供应给他的消费品所包含的价值真的是相等的話，那就是说，他取回了他贡献给社会的劳动的全部。但是，这样就成了拉萨尔式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领回的只能是在扣除为社会基金劳动的部分后的劳动部分。工人只是以这部分劳动，到社会上领取与这个劳动量相当的那么多消费品。可是这样一来，工人贡献给社会的与他所换回的就不能说是等价的。所以，这里根本谈不到是等价关系。”

①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9年修订第三版，第526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2页。



在上述这段话中，实际上包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消费基金的分配问题；一个是商品的等价交换问题。所谓“工人领回的只能是在扣除为社会基金劳动的部分后的劳动部分”，这是指分配来说的。通过分配，工人们取得了货币工资，即取得了一般等价物。这个过程用公式来表示，就是：“劳动(为自己劳动部分)……货币(货币工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因为劳动力不是商品，所以在分配过程中当然也就不存在着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等价关系”；工人们也并不是把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都取回去，而只是取回为自己劳动的部分。分配的结果，工人们取得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但货币本身并不能直接消费，还必须由货币向消费品转化。于是继分配之后，又开始了第二个过程，即交换过程。胡钧同志所说的“工人只是以这部分劳动，到社会上领取与这个劳动量相当的那么多消费品”，其实，就是指此而言的。只有经过交换，工人们才能够取得消费品（直接供给的部分除外，如果有的话），用以去满足自己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所以交换过程乃是分配过程的补充和继续，它是分配与消费之间的桥梁。它的公式是：“货币——商品”，即真正的等价交换。总之，工人们从领取货币工资起，到取得消费品止，要经过两个既有区别、又互相衔接的过程：

(1)分配过程：“劳动(为自己劳动部分)……货币(货币工资)”。

(2)交换过程：“货币——商品”。

胡钧同志把这两个过程攪在一起了，用一个去咬另一个，遂使读者如墜五里霧中。“这里根本谈不到是等价关系”——这本来是

指分配来说的，但一翻手之间，他却又把这种非等价关系轉嫁到交换的头上，并由此否定了交换的存在。

(二)胡钧同志在某些地方又把交换与分配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了：

第一，他认为商品交换是通过“物”来实现的非等量的劳动交换，而分配则不是在物的形态上进行的等量的劳动交换(这里所说的劳动，是指活劳动或流动状态的劳动)。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无论是商品交换或消费基金的分配，都不能离开“物”，因此，以“有物”或“无物”为标准把两者截然分开，那是没有根据的。至于说分配是等量的劳动交换，交换则不是等量的劳动交换，如前所述，这也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说：“说到消费品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着在商品等价物的交换里也通行的那个原则，即一种形态的一定数量的劳动可以与另一种形态的同量劳动交换。”^①可见两者都是同一种形态的一定数量的劳动与另一种形态的“同量劳动交换”，即都是等量的劳动交换。那么，既然两者都是等量的劳动交换，是不是还有区别呢？区别当然是有的：在分配领域中的等量劳动交换，是指在作了各种必要的扣除以后(这里包含着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劳动者相互之间的等量劳动交换；而在交换领域中的等量的劳动交换，则主要是劳动者以他们在分配领域中所取得的一般等价物(货币)与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消费品的等价交换，这里主要是表现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有这样的区别，但我们却不能把这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5年版，第21页。



两种等量的劳动交换互相对立起来。

第二，胡鈞同志說：“真正商品关系存在的地方，参加商品交换的人们的收入，是由交换的结果决定的。劳动的质量只能由交换来评价。但是，国营企业中工人的收入水平却与商品交换本身没有联系。……他们的收入只是根据他们的劳动技能、熟练程度和支出的劳动数量等决定，而根本脱离商品交换那种‘等价原则’所引起的后果。”这就是說，消费基金的分配与商品交换是没有关系的。的确，国营企业中职工的固定工资额，是不受商品交换条件（包括价格的涨落）的直接影响的。但这决不等于說交换与分配就没有关系了。商品价格的涨落虽然不直接影响职工的工资额，但却影响他们的货币工资的购买力，也就是影响他们的实际工资或实际收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职工实际工资的增长，除了扩大社会福利事业以外，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其一，是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他们的货币工资额；其二，是在货币工资额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物价水平；其三，是上述两者兼而有之。用降低物价的办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增加职工的实际工资（以及全体居民的实际收入），即使說这是国家预定要增加分配给职工的消费基金，但毕竟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又怎能說交换对于分配没有影响呢？在商品和货币还存在的条件下，消费基金的分配，主要是通过商品交换来最后实现的。宁可以說，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是实现按劳分配的一个重要条件。等价交换同按劳分配是血肉相連的。反过來說，分配对于交换也是有影响的。职工人数的增加和他们的货币收入的增加，直

接影响到商品市場的供需状况。一九五八年我国在大跃进中，某些消费品之所以曾經一度发生供不应求的现象，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职工人数的大量增加和他们购买力的迅速提高。这不是分配影响交换的証明嗎？馬克思写道：“我們所得的結論，并非說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說，它們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統一体的不同的方面。”^①既然分配和交换是一个总体的两个环节，又怎能互不相关呢？

第三，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鈞同志认为按劳分配和商品交换“这二者是两种本質不同的經濟关系，因而不能同时存在于一种关系之中。”“在存在实質商品交换关系的地方，是不能完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就統一的社会范围内，即就通过商品形式交换自己产品的双方的关系来看（不是就每个集体所有制經濟内部來說），是与按劳分配原则不一致的。……真正的商品的等价交换却并不总是有利于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的。”为什么商品的等价交换与按劳分配竟如此互相排斥、以致不能同时并存呢？这是因为“按劳分配所要求的等量劳动的交换是直接的劳动交换，而商品关系所反映的等量劳动交换是在物的形态上的劳动的相互交换，即等价交换。二者的本質的区别，……就在于这个‘等量劳动’中是否包含生产资料的优劣所带给劳动生产效率的影响。”明白地說，就是由于生产资料的优劣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以致商品的等价交换并不是等量劳动的交换，而只

① 参看“政治經濟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1頁。引者根据N·I·Stone的英譯本，將譯文略有改动。



有按劳分配中的直接的劳动交换才是等量的劳动交换。所以据胡钧同志看来,凡是存在着非等量劳动交换的地方,就扰乱了或影响了等量的劳动交换。按劳分配与等价交换之所以不能同时并存,乃是由于等量的劳动交换与非等量的劳动交换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

所谓商品交换“不是等量的劳动交换”,以及按劳分配中的劳动交换“不是通过物的形态来进行的”,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而既然所有这些都站不住脚,于是胡钧同志上述论断的理论根据,也就发生问题了。

而且,如果说在存在着商品等价交换的地方,就不能完全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那么,在我国目前广泛地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按劳分配岂不是成为一种有名无实的東西了嗎?照此推论下去,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要按劳分配,那就得抛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或者我们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那就得抛弃按劳分配。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鱼”和“熊掌”我们都要,何况二者并非不可得兼,而是相得益彰的。在目前我国的条件下,既然按劳分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通过商品的等价交换来实现

的,假如我们抛弃了商品交换(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并不是有利于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而是使按劳分配失去了凭借。

不仅如此。如果由于生产资料的优劣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存在实质商品交换关系的地方,是不能完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那么,在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之间,因为广泛地存在着商品交换关系,于是双方也就都不能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了: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因为生产资料较优,在交换中占了便宜,所以在分配中除了按“劳”以外,还加上一个按“资”(生产资料);反之,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则因为生产资料较劣,在交换中吃了亏,所以按劳分配也就打了折扣。当然,胡钧同志并没有这样说,也可能没有这种想法;但人家如果按照逻辑推论下去,那可怎么办呢?

总之,我认为把等价交换与按劳分配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以上这些意见很不成熟,也可能对于胡钧同志的文章有误解的地方,请胡钧同志和其他同志多加指教。

編者的話

有关经济理论方面的问题,本刊已陆续刊载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对有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问题,进行了不同意见的讨论。本刊收到不少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的文章,但是由于篇幅所限,这些文章多数没有能够发表,谨向作者致以歉意。我们希望今后讨论的范围和问题更加广泛,除了继续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以外,还讨论国民经济各部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問題,综合平衡和速度的問題,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其他重大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

